

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 :概述与思考

汪品级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系统地考察 1949 年建国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 ,并探讨了造成各个阶段不同特点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中国的对外开放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的状况 ,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部分开放到闭关自守再到开放 ,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 ,反过来对国内政治和传统文化施加着强大的影响。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必须予以反思 ,以防止民族文化的危机。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开放政策 ,国际结构 ,国内传统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1)33-0030-04

按照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 ,世界文明史的本质就是新的文化技术代替旧的文化技术的过程。随着一种新的文化技术的普及 ,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都迟早要发生变化。^①要打破一种长期以来的习惯 ,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技术 ,不亚于一场痛苦的蜕变。本文将表明 ,一个落后的民族 ,所需克服的情性和封闭性是一场真正的革命。^②这样的一场革命 ,又极易演变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彻底的破坏。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对外开放历程的几个阶段 ,并揭示过度开放所蕴含的文化危机。

一、五十年代 结盟自主与部分开放

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 ,呈现出部分开放的特征。这里所说的部分开放 ,所指的主要是具体的外交关系 ,而不是某种外交姿态或者声明。我们考察建国初期相关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 ,不能不提到三大外交政策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是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总方针 ,奠定了整个 50 年代外交政策的基础。

三大外交政策总的倾向是对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一个否定 ,认为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外交关系仍然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关系的继续。“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

和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 ,按其内容 ,分别加以承认 ,或废除 ,或修改 ,或重订。”^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 ,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 ,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 ,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④既然是打扫干净屋子 ,那么就先不能让帝国主义国家进来了。而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 ,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国际体系中的主体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带有明显的内倾色彩的政策。

具体来说 ,新生政权对于旧的政治特权的废除非常坚决和迅速。例如 1950 年北京军管会征用各国根据 1901 年《辛丑条约》所建筑的兵营和地产。但是对于外国在华的工商企业 ,新生政权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这个态度和建交谈判政策的态度是一致的。新政权并未一刀切 ,立即对外国私人在华企业进行国有化。对外国企业进行征用、代管的措施主要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之后 ,是一种带有反击性质的行为 ,而且措施的重点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对于一般中小企业 ,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般性企业 ,中国政府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继续经营。”^⑤

这样一种谨慎的而非一味排斥的外交政策 ,对于一个

①[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新华出版社 2003 年中文版,第 442 页。

②波普把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作为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转引自叶自成《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文化政治的开放及其正负效应》,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③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 页。

④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收稿日期 2011-10-14

作者简介 汪品级(1974-)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新生政权,尤其是要面对许多对自己不友好的强大国家的政权来说是明智的。然而“另起炉灶”的政策和外交事务本身的开放性和多边性,都使得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国际体系中纵横捭阖的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的东亚世界体系从来没有形成和西方一样的主权平等的外交传统。^①1840年开始的百年灾难又使得外交往往是战争之后的屈辱之举。即便如此,新生政权还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努力融入当时的国际社会。这应该说是当时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比较含蓄的动作,并没有很明确的表达。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1954年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上,中国政府表现了相当的开放和友善。“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由于当时的国际体系已经出现了美苏对峙的两极结构,而中国坚定地奉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另外一个特点:部分开放,也就是对国际体系中的部分国家开放。对苏联开放是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放的领域和深度都非常之大。从政治模仿到经济交流,严密的同盟关系使得西方看来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体。1950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6%,而到1953年则增加到76%。^②但是,同盟关系使得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也加强了中国对外政策内倾色彩。例如,苏联要求中国采取措施,禁止外国势力进入新疆和东北。

当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后,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似乎准备扩大这种“部分开放”的对象。在许多场合,毛泽东讲过要向更多的国家学习,甚至向日本学习。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③这样一种开放的思想,应该说是全面的、积极的开放思想。可惜这种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相反,由于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恶化,以及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不断发展,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封闭性的不断加深。

二、六七十年代:革命外交与相对孤立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被形象地归纳为“两个拳头打人”的时期,也是革命外交逐步张扬的时期。在对外援助超出国力、到处宣扬

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却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为孤立的时期,与美苏两大势力集团、处于中间地带的民族主义国家和许多周边国家都发生了冲突。这种极度张扬而又极度孤立,恰好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两面。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发展成为六十年代初的大辩论,继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为国家利益的冲突,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在1972年中美和解,形成一种准结盟关系之前,与美国的关系仍然保持着一种敌对的关系。1965年越美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④在许多国家,亲美或亲苏的政权上台后,就中断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制约使得中国的外交空间极为狭小,也反过来加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逆转。

“两个拳头打人”,同时与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决定性力量为敌的恶果,在许多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清楚。1962年,中印发生了边界冲突,这场冲突中国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但是,由于美苏均支持印度,中国反而显得形单影只。第二次亚非会议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65年,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公然提出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而苏联政府也坚持要求参加。在后来的亚非外长会议中,一些国家试图把苏联拉进来,使会议陷入混乱局面。美国对亚非会议也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首先是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对联合国发出了邀请,而联合国当时是在美国控制之下的。中国和朝鲜自然不能接受。中国力图在亚非会议上的决议里谴责美国,而许多亚非国家,或者是美国的盟国,或者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自然不能公开谴责美国。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压力使得亚非会议本身就四分五裂了,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亚非会议被迫无限期延期,应该说这是对中国一个最有利的结果。各国的外交政策必然是先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对它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口号,自然不可能起到太大的凝聚作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是中国在多边外交里遇到的严重挫折,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范围大大缩小。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革命外交在东南亚产生了恶果。与印尼的关系在“九·三〇”事件后跌到低谷,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关系也急剧恶化。原来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待,60年代则转变为支持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这样就导致了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周边国家政府关系的急剧恶化。当时林彪试图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验应用到世界上去,提出所谓的“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世界的

①[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37页。

②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76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④据1978年的统计,中国给越南的援助价值高达200亿美元,其中无偿部分为188.4亿美元,贷款为13.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许多的方便和帮助。参见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最后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这样的主张。因此,一旦哪个国家爆发了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或者暴动,中国当时就予以支持,公开宣传打倒“各国反动派”。例如,1967年7月印度大吉岭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中国认为这是“印度的春雷”。^①中国和40多个建交、半建交的国家都发生了外交纠纷,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之所以有的国家还保持着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本身从地域和力量来说还是个大国,具有一定的地缘战略意义。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在国际体系中也得到自己应有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和美国的联盟主要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经济和文化上;和其他国家的建交也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经济上的互利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内容和目的。中国既没有5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模仿和引进,更谈不上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对外交流。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主要集中精力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一个一个的运动接踵而来,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自然既无精力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当时的极左思潮泛滥,“美帝”“苏修”一起反。而如果对外开放,利用国外的经济和先进技术,必然首先就要依靠美国和苏联,或者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国内政治斗争所不能允许的。整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建国以来外交关系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三、八十年代以来 政治自主与全面开放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主要的是经济的对外开放,是对一切国家的开放。他一再强调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③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基础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的基础有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的对外开放,主要的不是从世界经济整体性、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出发的。虽然曾经提过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之类,但只是学习,并不是交流,甚至连学习也没有落到实处,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世界经济的不可分割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交流、资金流动的重要性。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治倾向很小,主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而不是意识形态阵营之争。

如前所述,在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虽然有

限,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开放。相比之下,开放的对象多了,领域倒是有所收缩。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50年代在所有领域的开放,并不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开放,中国在许多内政方面受到苏联的干预。而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开放,聚焦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技术,在政治方面与其他国家发展平等、友好的关系,是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对外开放。

为了推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废止了两面出击的错误战略,同时搞好和美苏的外交关系,坚持真正的独立自主不结盟。和美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的外交发展拓宽了很大的空间。外交空间的扩大,使得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巨大资源。中国不仅同各国发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关系,而且在多边外交中发挥了日益积极的作用。多边外交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外交方式,一方面需要国家本身的实力地位,另一方面需要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更需要一种自信和积极的外交心态。可以说,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卷入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对中国经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渗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卷入过程中,传统的很多习惯、利益集团和文化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以前我们常说国内政治决定对外政策,但是当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对国内政治影响似乎要强得多。也就是,当前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利用国际压力来促使国内进行改革的阶段。加入WT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WTO有两大特点:一是一揽子协定,若签了这个协定,一定要全部执行所有方面的协议内容,不能按照利弊得失任意取舍;二是强制管辖制度。世贸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它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拥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如果有一个国家不执行某方面的协议,另一国家可以向世贸组织提出裁决申请,由世贸组织给予裁决,如不服从者,世贸组织可授权成员国采取报复措施。^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权力介入经济活动较多,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十分严重。中国“入世”后,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打破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⑤再例如中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对国内政治有着重要制约的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工人有自己组织工会、结社的权利。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能够打破明清以来的浓重的保守

^①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26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④徐家良《加入WTO政府需要做什么》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⑤郑秉文《“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色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道路,既是国际体系的压力,也是国内政治的主动选择。从整个体系来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新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日益迅速和广泛。如果把自己隔离于一体化的趋势之外,就无法及时地跟上世界的步伐。而“落后就要挨打”。八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竞争已经从政治和军事竞争的角度转向了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毛泽东时代,拥有核武器和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可能可以确保自己的国际地位,但是在邓小平时代这不可能了。苏联由于封闭、保守,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一落千丈,民用经济发展脆弱和极为浪费,结果带来的是解体。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体系的压力是真切的,也是紧迫的。全球化——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①

从国内政治本身来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使得政府推进改革具有必要的权威。如果在一个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关系的转向其难度则要大得多,也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在中国,即使是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总体政策。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务实外交的作风,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相对于长期以来的传统和习惯势力来说,对外开放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借助这一强大的力量,打破长久的一些陋习、从质的角度改变中国普通百姓的面貌,打破地方的封锁和封闭背后的种种黑箱,是非常积极和有效的。

小结与思考 对外开放与民族文化

既然开放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一种不可逆转的强大潮流,那么讨论开放的利弊之争似乎过于宏观和不够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开放虽然是全面的,军事、经济和文化

都应该具有开放的心态和精神,但在实践中,我们对西方的学习却往往是片面的。也就是说,往往只着重于一些物质技术、生活习惯方面的东西,对西方哲学的精神、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却知之甚少。传统文化在开放的大潮中已经处于弱势地位,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漠视、抛弃往往都在国际化、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下进行。

全面开放不是无限制的开放。一个国家除了追求自己的实力地位以外,同样要追求一些别的东西,例如文化的自主性、文明的独特性。丧失了一种独特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国家,纵然能在国际竞争中一时取胜,却难以具备长远的竞争力。因为文化和文明的推动力总是隐含的、长远的,作用于人的本身。即使是美国,这个我们视为没有多少文化传统的国家,也是建立在几千年的欧洲文明传统的基础之上。^②当西方国家发展到高度发达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试图回头看看东方的文化,称赞和谐的精神。这就是一种对旧传统的发现,对文化精神的反思。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而要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国际政治中心,不能不发扬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也就是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所倡导的“软实力”。^③回顾美国霸权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了一系列贯穿了美国价值观、理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从而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有力地支持了美国霸权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强势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构成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中国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使命就变得更为迫切。对外开放不应该仅仅是强势文化的引进和对民族文化的替代,更应该是对外输出和发扬。在全球化中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色,既有益于世界,也有益于自身。

Exploring the Course of Open Policy since 1949: History and Reflection

WANG Pin-ji

(Chni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ree phases of Chinese open poli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in 1949,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s and domestic root. China's openness to outside, which is to great extent constr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influe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is a profound revolution. At first partly open policy, then closing the door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until now "being open" has developed to be a new tradition, which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openness should be reflected to avoid the crisis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Diplomacy; Ope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Domestic Tradition

(责任编辑 / 范秀利)

①[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86—89页。

②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③See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88, 267.